

第1单元 翻译的历史

学习要点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了解到：

-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翻译高潮，包括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技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以及“五四”以来的现当代翻译；
- 西方历史上的翻译概貌，包括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近代以及现当代等几个时期内主要西方国家的翻译活动。

1

一、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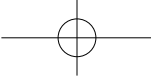
1 中国翻译史概况

翻译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活动与交流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虽然古代原始社会的口译或笔译无文献可查，但我们可以设想，在原始社会不同部落间的交流一定是离不开翻译的。以我国为例，据《周礼》和《礼记》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翻译的官职了，如《周礼·秋官》中说：“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马祖毅 1998：2）。从这段记述来看，当时的“象胥”是一种官职，其职责就是翻译。

漫长的中国翻译史，大致可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清之际的科学翻译；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五四”至 1949 年前的社会科学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

1.1 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

两汉时期，佛教从印度及中亚地区传入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于是拉开了序幕。从可查考的历史资料来看，我国的佛经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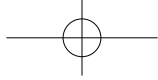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译始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有了恢宏的发展，经律论皆有输入，唐朝时佛经翻译的规模和数量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进入北宋后，佛经翻译开始式微，到元朝，虽也有零星翻译，但已是尾声了。在长达 1000 余年的佛经翻译史中，到底有多少译人参与，到底译出了多少佛经，现在已经无法做出精确的计算了。据我国唐代《开元释教录》的记载，截至唐朝开元年间，汉译佛经典籍和中国佛学著作的总数，已经有 1076 部、5048 卷。以后又有不断增加。清代所刻《龙藏》，收有 1696 部、7168 卷。日本学者自 1924 年陆续编印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则收录至 3053 部、11970 卷。我国从 1984 年开始编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所收经籍预计将达 4200 余部、23000 余卷。浩如烟海的汉译佛教经卷，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整个人类的文化财富。

历时久远的佛经翻译对我们今天从事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佛经翻译形式的演化。大体上以西晋为界，佛经翻译可划分为两个时期：西晋之前，多属私人授受，即以个体翻译或数人合作为主，没有一定体制，随时随地，皆可译出。此时译人以梵胡客僧为主，但往往有汉人作笔受，如经系口诵，则另有人先将其口头转为汉语。这种译经方式产生的译文，往往音义隔阂，无由正是。西晋以后则出现了有明确分工的“译场”组织，译经采用集体合作的方式。译经之时，有主译者，宣讲经义；有证义者，证其译义之真似；有校勘者，译毕后校核全文。参与译事者其角色分工最多时达十余种，而现场旁听者有时更是多达数千人。而第二期又可以隋为界，划为两个阶段：自西晋至隋，译经与讲经同时进行，译场组织较为松散。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是鸠摩罗什(Kumarajiva)为主的译场。鸠摩罗什是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有名的译家，后世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他本来是西域人，自幼智慧过人，会背诵很多佛经，在当地十分有名。后来他来到中国当时的都城长安专事译经传法。当时的后秦王姚兴对他十分敬重，还专门为他提供了两个译经和讲经的场所。可以说，从鸠摩罗什开始，佛教译经正式成为了封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由国家提供资金，组织人力。

据史料记载，鸠摩罗什译经时的场面是很大的：“什既至止，……于是(姚)兴使沙门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三千徒众，皆从什受法。”(僧祐 1995: 533-535)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参加鸠摩罗什译场的共有 3000 人之多。不过，这几个参与参与者并不都是帮助鸠摩罗什译经的。当时译场的一大特点就是“讲译同时”，即在译经的同时也向众人宣讲佛经义理。参与者在听讲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或疑惑，可以随时向主译者提问或质询。

南北朝以降，翻译渐成国家大事，政府的重视和资助使佛经翻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隋朝统一中国，隋文帝亲下诏书，开设经院，立翻经学士，广



求中外僧人共襄译事，沿袭前朝译场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之。及至唐代，佛教在中国空前繁荣，佛经翻译也是如日中天。主译者开始以本国僧人为主，译经的计划性更强，译场制度益臻完密，并呈现出同前期译场不同的特点。如唐代伟大的佛经翻译家玄奘主持的译场，其参与者只有几十人，与鸠摩罗什的译场相比，人数大大减少。此外，鸠摩罗什的译场是对外开放的，凡有兴趣者皆可参与，主译者公开宣讲，并同听众辩论义旨，最后集合各方意见笔录成文。玄奘与此不同，他并不是公开宣讲，而且禁绝闲人接近，理由是“妄相观看遂成阙阙，……非直违触宪网，亦为妨废法事”（慧立，彦棕 1983：130），其实主要是担心他们干扰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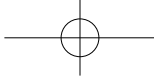
玄奘的译场虽然参与人数少，但据赞宁《宋高僧传》卷三所述，其译场共设十种职司，参与者有着细致明确的分工。从这些程序的设置，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译经制度，已经日臻成熟。这种严谨细致的集体翻译方式，为佛经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证。

1.2 明清之际的科技翻译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和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的文明和文化也开始向世界其它地区传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在将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介绍到中国的同时，也将西方的科技文献译介进了中文，从而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翻译高潮。

这一时期杰出的代表人物为著名的科技翻译家：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罗雅谷（Jacques Rho）、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德国人汤若望（Adam von Bell），以及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中国方面有被誉为“科技译祖”的徐光启以及有“中华之才”之称的李之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译家就是利玛窦。利玛窦1582年来到澳门学习汉语，1584年到了广东肇庆，并通过讲学和拜访等活动，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后来他来到北京，得到神宗皇帝的接见，并结识了很多的公卿士大夫。他同中国友人合作，翻译了不少西方的科技书籍，如他与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利玛窦在将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著作介绍给了西方世界，如他将中国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译成了拉丁文，开了将中国典籍介绍给西方世界的先河。

根据马祖毅先生的研究，“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中，知名的总计在七十名以上，一般都有译著，成书三百余种，除宣扬宗教迷信的书籍外，其中有关科学的占一百二十种左右。”（马祖毅 1998：267）这些传教士翻译的西方著作涵盖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冶金采矿、军事技术、生物学、舆地学以及语言学等多种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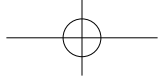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必须承认的是，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的第一身份并非翻译家，而是宗教传播者，有着明确的传教目的和方针。不过，这些传教士十分讲究传教的方式方法，富于变通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通过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向后者介绍西方的科技知识。这一策略的确有效，对于那些只会作八股文章的中国官僚知识分子来说，西方的科技知识简直是闻所未闻、充满诱惑，因此他们都愿意与西方传教士交往，并且帮助他们将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其实，如果没有中国官僚阶层的支持与合作，恐怕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译介活动也不会取得多大的成就。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统治阶层对欧洲传教士普遍采取宽容友好的态度，这为传教士大量引介西方著作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客观环境。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因他本人十分喜好科学技术，因此对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十分支持，多次召见他们，并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其次，在翻译方式上，明清时代的西方科技翻译虽然没有发展出佛经翻译那种参与人数众多、程序谨严的译场方式，但由于传教士汉语能力的原因，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依赖中国士大夫们的合作。具体而言，他们的合作方式可以称为“西述中书”，即传教士口译或口述，中国人笔译和润色。除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书籍外，其他合译的例子还有熊三拔和徐光启合译的《泰西水法》，傅泛际和李之藻合译的《名理论》等。

虽然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主要不是译介科技著作，但他们的翻译活动毕竟在客观上引入了西方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的逻辑推理和科学考证方法，激发了中国官僚知识分子对西方科技的兴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科技事业。明清之际的西方科技翻译历时大约二百余年，在中国翻译史上形成了继佛经翻译后的第二个翻译高潮，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佛经翻译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传教士所进行的翻译活动是双向的，他们在将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文化产品传播到了西方。应该说，在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中国和欧洲在文化上一直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教士的翻译活动有重大的开创意义，他们是文化传播的使者，是中西文明互相交流的中间人。

1.3 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

1840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大门被迫向西方开放。伴随着欧美列强的军事和经济入侵，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也开始渗透进来。泱泱中华在昔日“蛮夷”面前的节节败退和割地赔款使中国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忧患，同时他们开始积极地探索从西方引进和借鉴救国强国之道。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于是应运而生，且一直持续到 1919 年的“五四”爱国运动。



第1单元 翻译的历史

1

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救国图存和文化兴邦的性质。从参与翻译活动的主体来看，主要包括以奕訢、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西方各国在华的教会机构以及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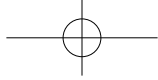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洋务派官僚创立的翻译机构主要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和北京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是李鸿章于1865年创办的，后来附设了翻译馆。翻译馆内汇集了一批当时有名的中外学者，从事物理、化学、天文学、兵法、医学以及器械等方面著作的翻译。根据1909年出版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翻译馆译书总数为160种。

1868年，在奕訢的奏请下，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后在同文馆下又增设了翻译馆，专事翻译西方著作。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以学者和科学家为译者主体不同的是，在同文馆从事翻译的主要是在该馆学习外文的学生，这就导致同文馆的翻译质量同制造局翻译馆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梁启超先生曾将两馆对同一原著的翻译进行过对比，结论是：“同文馆所译《化学闡原》，闻即《化学鉴原》云，西文本同一书，而译出之文，悬绝若此。”（马祖毅1998：345）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走上了历史舞台。维新派要求变法自强，其途径之一就是引进西方和日本的学术思想。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译书之风大盛。当时从事翻译活动的多为各地的报社，较有名者如《时务报》、《实学报》、《农学报》、《译述公会报》、《格致新闻》、《中外纪闻》、《湘学新报》、《新知报》等。此外，各地还成立了一些机构专事翻译，如上海的强学会、南洋公学译书院、务农公会、大同译书局、译书公会，北京的官书局，武昌的知学会以及桂林的圣学会等。维新派主导的翻译主要集中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著述以及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其翻译家中最有名者当属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又陵，福建侯官人，曾留学英国，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严复的译著主要为西方社会学著作，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穆勒（John Mill）的《群己权界说》（*On Liberty*），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等。

严复的翻译在当时中国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固然主要是因为著作本身的内容引发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对西方理论学说的好奇心，但同时也是因为严复在翻译方法上的用心。严复的翻译使用的都是古代文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严复1984：136）。他这样做，并非只从语言风格本身着眼，而是有着特定的目的，即他认识到“这些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



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王佐良 1989：42）

晚清时期，文学翻译之风大盛。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译家之中，最有名的是当时与严复齐名的翻译家林纾（1852-1924）。林纾同严复相仿，也是使用文言文翻译西方作品。但同严复不同的是，林纾翻译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学作品，如《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等。林纾翻译的作品数量大得惊人，共计 180 种左右，但他本人却是不通西文的。他在翻译时，都是别人口述，他自己作笔录，因此严格说来，林纾做的其实不是“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而是“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即将汉语白话翻译成文言文。

由于林纾翻译的主要都是文学作品，因此在当时不像严复的翻译那样反响强烈，但其影响亦不容小觑。这些翻译作品使思想闭塞的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不少一流的外国作家，在思想上接受了外国文学先进思想的洗礼，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中国政治界和思想界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除林纾外，周桂笙（1873-1936）、伍光建（1867-1943）、曾朴（1872-1935）等人也译介了不少西方的小说作品。在小说之外，欧美的戏剧、诗歌以及散文等领域都有大量的作品被译成中文，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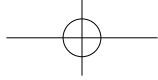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总体而言，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其目的在于救亡图存，就效果而言，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管是洋务派的自然科学翻译，还是维新派的政治哲学翻译，还是学者文人的文学翻译，尽管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清朝政府的命运，但这些翻译活动毕竟使国人了解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和社会思想观念，丰富了国人的精神生活，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1.4 “五四”至 1949 年期间的翻译活动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国家的落后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借助西方先进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科学技术唤醒蒙昧无知的国人。一大批知名的学者和翻译家广纳博取，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科技著作，在中国翻译史上掀起了另一次翻译高潮。

在文学翻译方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梁实秋、周作人、傅雷、刘半农和巴金等人。

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巨匠，鲁迅也做了大量的翻译，其译作约占其全部作品的一半以上。在鲁迅翻译的作品里，一多半都是俄国及苏联的作品，如爱罗先珂（Vasili Eroshenko）的《桃色的云》、《世界的火灾》、契诃夫



第1单元 翻译的历史

1

(Anton Chekhov) 的《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果戈理 (Nikolai Gogol) 的《死魂灵》以及法捷耶夫 (Alexander Fadeyev) 的《毁灭》等。此外, 鲁迅还翻译了日本作家小路实笃 (Saneatsu Mushanokōji) 的《一个青年的梦》、厨川白村 (Kuriyagawa Hakuson) 的《苦闷的象征》, 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鲁迅的这些译作多半是革命的文学作品, 目的是为当时正在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中国人民提供精神上的鼓舞。

大文豪郭沫若同样译著等身, 早在 1917 年左右即开始翻译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和海涅 (Christian Heine) 等人的诗作。1921 年, 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创立了创造社, 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和日本的作品, 其代表译作包括德国施笃谟 (Theodor Storm) 的《茵梦湖》、歌德 (Wolfgang Goethe) 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席勒 (Friedrich Schiller) 的《华伦斯坦》, 日本河上肇 (Hajime Kawakami) 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俄国屠格涅夫 (Ivan Turgenev) 的《新时代》、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的《战争与和平》, 英国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 的《争斗》与《法网》以及美国辛克莱 (Upton Sinclair) 的《石炭王》和《屠场》等。

另一位文学巨匠茅盾同样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茅盾从 1916 年便开始进行翻译活动, 其后在主编《小说月报》等刊物时也亲自翻译了不少作品。他在 1920 年至 1921 年之间翻译了近百篇短篇小说, 此后又翻译了不少散文、剧本和小说, 其代表译作有西班牙倍那文德 (Jacinto Benavente) 的《倍那文德戏曲集》, 苏联丹钦科 (Nemirovich Danchenko) 的《文凭》、吉洪诺夫 (Nikolai Tikhonov) 的《战争》、巴甫林克 (Mykhailo Pavlenko) 的《复仇的火焰》, 法国左拉 (Emile Zola) 的《百货商店》等。茅盾翻译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革命性, 如他翻译的短篇小说多出自北欧、东南欧和亚洲的一些弱小国家, 长篇小说则多出自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

此外, 这一时期比较有成就的翻译家还有瞿秋白、成仿吾、郁达夫、曹靖云、韦素园、冯至、梁实秋、周作人、胡适、田汉、傅雷等。

在这一时期, 我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文艺理论的翻译, 如《共产党宣言》、《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剩余价值学说史》等。这些译著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时期, 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向外国系统地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 这方面最成功的当属林语堂。林语堂英文造诣极高, 长期在欧美生活。他用英语创作了一系列轰动欧美文坛、影响深远的作品, 并将《论语》、《老子》、《庄子》、《浮生六记》等优秀中国文化作品译介给了西方读者, 对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1.5 新中国成立后的翻译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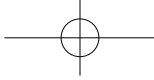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新的面貌，翻译作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飞跃发展。1949年前，中国的翻译活动有着明显的“散兵游勇”式的个体翻译特征，而在1949年后，翻译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等机构，系统地引进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献等。正如茅盾在1954年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

1

在过去，极大多数的文学翻译工作，是在分散的、自流的状态中进行的。从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作品的选择，常常是凭译者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有些译者甚至对自己是否胜任这一翻译，也考虑得很少。……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一切经济、文化事业已逐渐纳入组织化计划化的轨道，文学翻译工作的这种混乱状态，决不能允许其继续存在。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有关方面，统一拟定计划，组织力量，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茅盾1984：505-508）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翻译队伍不断壮大，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如主要翻译马恩列斯作品的师哲、陈昌浩、张仲实、郭大力，翻译苏联和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楼适夷、周立波、高植、飞白，翻译日本文学作品的下立强、陈应念、丰子恺、姜晚成、晋中、文洁若，翻译法国文学作品的郑永慧、郑克鲁、罗大冈、赵瑞蕻，翻译英美文学作品的曹未风、荣如德、周煦良、杨必、张谷若、王科一、许渊冲、黄邦杰、王仲年、董衡巽、张友松、施咸荣、陆谷孙、董乐山，翻译德国文学作品的钱春绮、田望德、杨武能等。此外，还有不少翻译家从事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弱小国家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

从出版物来看，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为主的出版机构引进、翻译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一些重要作家的选集或全集，如《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契诃夫小说集》、《巴尔扎克全集》、《托尔斯泰文集》、《安徒生童话全集》、《泰戈尔作品集》、《肖伯纳戏剧集》等。近年来，中国翻译家对外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选》、《当代诺贝尔文学奖作品丛书》、《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等作品的面世，使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了当代世界文学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成就。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印行，至今已达400余种，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多个学术领域。

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自1978年至1990年，全国出版人文社科类翻译作品2.85万种。从1996年至2006年，翻译类新书（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达到了12.75万种，内容涵盖语言、文学、哲学、财经、科技、电子和文化生活等众多学科和领域。中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大量翻译外国作品、让国人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中国的翻译家也积极地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外文，为国外的读者架起了解中国的桥梁。这其中成就最突出的翻译家当数杨宪益和他的英国籍妻子戴乃迭（Gladys Yang）。杨氏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外文局工作，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作品，如《诗经》、《离骚》、《史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此外，他们还翻译了不少鲁迅、沈从文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杨氏夫妇的译笔简洁流畅，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氏夫妇最初就职的外文出版社是中国较早的对外出版机构。今天，它隶属于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是国内承担对外传播工作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之一，每年出版大量外文图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门类。在出版外文图书的同时，中国外文局还出版《北京周报》、《今日中国》、《中国画报》、《人民中国》等周刊和月刊，这些出版物用不同的语言向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据统计，2007年，外文局共发行外文期刊600多万册，图书发行3000多万册。

此外，从事对外传播领域翻译工作的还有新华通讯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海外英文频道、西班牙和法语频道等，这些机构为让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做了大量的翻译和传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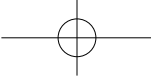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逐渐成为对外传播领域内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使用外文发布新闻的主要网络媒体有人民网（6个语种）、新华网（5个语种）、中国网（9个语种）、国际在线（43个语种）和《中国日报》英文网站等。

2 西方翻译史概况

同在中国一样，在西方，翻译实践也是源远流长。一般认为，西方的笔译史肇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圣经》翻译，如此算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纵观西方的翻译史，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2.1 古代翻译

西方的古代翻译主要是罗马对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公元前4到3世



翻译通论

1

纪，希腊开始衰落，而罗马则逐渐强盛起来。但是，恢宏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军事上盛极一时的罗马一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时罗马的作家通过翻译，满足了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好奇。最早翻译希腊作品的翻译家是安德罗尼柯 (Livius Andronicus)，他用拉丁文翻译了《奥德赛》以及其他一些希腊的戏剧。此外，被誉为罗马文学之父的诗人恩尼乌斯 (Quintus Ennius) 和斯塔提乌斯 (Stattius Caecilius) 等人也都用拉丁文翻译了不少希腊戏剧。希腊有名的戏剧家如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和米南德 (Menandros) 等人的作品都被翻译进了拉丁文，在罗马广受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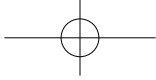
到公元前 1 世纪时，最有名的翻译家是西塞罗 (Marcus Cicero)。西塞罗出身贵族，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修辞学家。他翻译过很多希腊作品，包括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柏拉图 (Plato) 的《蒂迈欧篇》和《普罗塔哥拉斯》，色诺芬 (Xenophon) 的《经济学》等。西塞罗不仅是位多产的翻译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翻译理论家，他提出的“演说家” (orator) 式翻译与“解释员” (interpreter) 式翻译后来成为西方翻译理论中的经典名词。

西塞罗之后最有名的翻译家是卡图卢斯 (Gaius Catullus) 和贺拉斯 (Quintus Horace)。他们都翻译了不少希腊文学作品，对罗马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同希腊戏剧翻译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圣经》翻译。《圣经》中的《旧约》原文是希伯来文，而《新约》原文则是希腊文。基督教徒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试图将《圣经》翻译进其他文字从而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公元前 3 世纪，72 名犹太学者聚集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遵照埃及国王脱勒密二世 (Ptolemy II) 的旨意，开始着手将希伯来文《旧约》翻译进希腊文。最终翻译出来的译本被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Septuagint)，这不仅是西方翻译史上第一部《圣经》译本，也开创了西方翻译史上集体翻译的先河。

《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之后，《圣经》翻译一直赓续不断，出现了无以数计的译本，其早期译本中影响大的是哲罗姆译本。

哲罗姆 (St. Jerome) 是早期西方基督教的权威人物，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他翻译过大量的希腊作品，但最有名的还是他翻译的《圣经》。公元 383 年，哲罗姆受当时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 (Pope Damasus I) 的委托，先后译出了《圣经·新约》中的四福音书以及《旧约》中的《诗篇》、《约伯记》等篇章，后来，他又在助手的帮助下，完成了《圣经》全书的翻译，取名《通俗拉丁文本圣经》 (Vulgate)。这部译本得到罗马天主教的承认，成为定本，在西方影响巨大。



2.2 中世纪时期的翻译

西方的中世纪历史一般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崩溃时算起，到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时为止。在这段时间内，标志性的翻译活动是西方与阿拉伯著作的互译。

到8世纪时，阿拉伯人已经创立了辉煌的文明。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张，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巴士拉、托莱多和塞维利亚等地建立了大量的学校和研究中心。到8世纪时，阿拉伯人已经征服了希腊世界，当时大批叙利亚学者来到雅典，将希腊著作译成古希腊语，带回巴格达，之后这些作品又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由于翻译活动的兴盛，巴格达一度获得阿拉伯“翻译院”的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阿拉伯学术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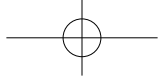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从11世纪开始，欧洲的学者对阿拉伯文化萌发了极大兴趣，开始将阿拉伯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包括大量原来从希腊文翻译成阿拉伯文的作品。当时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译者中既有欧洲的学者，也有阿拉伯的学者，二者之间有很好的合作。大主教雷蒙（Archbishop Raymond）创立的托莱多学校是当时从事翻译活动的主要机构，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的，汇集了一大批有名的学者，也使托莱多成为欧洲最主要的翻译中心。

在中世纪时期，不少希腊著作的原本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失佚，所幸阿拉伯人翻译并保存了大量的希腊作品。这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盖伦（Claudius Galen）、希波拉底（Hippocrates）等人的不少重要著作被从阿拉伯文转译成了拉丁文。这一时期最有名的翻译家有英国的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和比利时穆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格罗斯泰斯特是林肯（英格兰东部城市）主教，据说还是牛津的第一任校长。他翻译了《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和《论天》（*De Caelo*），以及大量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论。威廉用拉丁文翻译了《政治学》（*Politics*）和《诗学》（*Poetics*），并修订了大量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

2.3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

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思想和文化革命，是欧洲历史上划时代的大运动，为思想、文学、哲学、宗教和艺术等领域带来了巨大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翻译活动空前活跃和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高度，也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和优秀的翻译作品。

在宗教领域，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分别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翻译了《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贯穿路德翻译的中心思想是：如何用普通民众的语言表达上帝的意旨。路德采用了比较自由的翻译方式，大量使用德语中的口语词汇，还创造了许多新词。路德的《圣经》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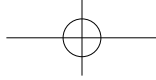
本被誉为第一部民众的《圣经》，它的问世，不仅给德国人的宗教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也对德语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6世纪的英国，《圣经》翻译也十分兴盛，最有代表性的译家当属廷兑勒(William Tyndale)。廷兑勒是基督教新教改革派，他从1523年开始，花了8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新约》和《旧约》的翻译。廷兑勒的翻译通俗、自然，兼顾了文学性和学术性，受到大众的欢迎。在翻译思想上，他从新教徒的立场出发，目的是宣传新教思想和主张，因此他的译本遭到当时主流教会的激烈反对，他的译本被焚烧，他本人也于1536年以异端罪被处以火刑。但廷兑勒的译本并没有因此而湮没，相反影响越来越大，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成为诸多《圣经》译本参考的版本。

在文学翻译领域，文艺复兴时期同样硕果累累，在德国，不少拉丁语古典作品如西塞罗、贺拉斯、普利尼(Pliny)和卡托(Cato)等古罗马作家的作品都被译成了德语。荷兰籍翻译家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翻译了琉善(Lucian)、欧里庇得斯等古希腊作家的文学作品。在法国，这一时期最大的翻译家当属雅克·阿米欧(Jacques Amyot)。阿米欧做过大学教授、王室家庭教师和主教，学问十分渊博。他的主要译作包括古叙利亚作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os)的小说《特阿革涅斯和卡里克勒亚》、古希腊作家朗戈斯(Longos)的小说《达芙尼斯河和洛亚》、古罗马作家普卢塔克(Plutarch)的《名人传》和《道德论说文集》。阿米欧的译文自然流畅，不事雕琢，对法兰西古典散文的形式影响很大，受到很多大文学家的模仿。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更是蔚为壮观。从希罗多德(Herodotus)、塔西佗(Tacitus)、李维(Titus Livius)、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波伊提乌(Anicius Boethius)、奥维德(Ovid)、阿普列尤斯(Apuleius)等古希腊和古罗马史学家、哲学家和演说家的作品，到欧里庇得斯、泰伦斯(Terence)、塞内加(Seneca)等古希腊和古罗马戏剧家的剧作，到《伊利亚特》、《奥德赛》和维吉尔的《伊尼特》，都被翻译成了英文。当时，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都加入到了翻译家的队伍。在所有的译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翻译的《名人传》。这本译作并非译自希腊文原本，而是根据法国翻译家阿米欧的法文译本翻译过来的，但其影响同样巨大。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对诺斯的译作称赞有加，在其戏剧创作中多次取材于这一译本。除诺斯外，当时英国著名的翻译家还有弗洛里欧(John Florio)和荷兰德(Philemon Holland)。前者以翻译法国作家蒙田(Michel Montaigne)的《散文集》著称，后者则翻译了李维的《罗马史》、普利尼的《博物学》和色诺芬的剧作等。

2.4 近代翻译

从17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西方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各国的翻



译活动继续蓬勃发展。

从法国来看，17世纪早期是法国古典主义的黄金时代，文学翻译复古之风大盛，但在翻译上，译者们更倾向于用当代的语言和更自由的形式进行翻译，代表性的译家是德·阿布朗古尔（Nicolas Perrot d'Ablancourt）。德·阿布朗古尔翻译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古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塔西佗的《编年史》。德·阿布朗古尔在翻译时十分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因此对原文有不少增删改动，自己发挥的地方比较多，这遭到了不少评论家的反对，认为他的译文“美而不忠”（les Belles Infidèles），但赞扬德·阿布朗古尔译法的也不乏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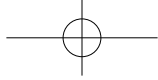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在18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在法国蔚然成风。大文豪伏尔泰（Voltaire）和翻译家迪西（Jean-François Ducis）、勒图尔纳（Pierre Le Tourneur）等人都翻译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其中勒图尔纳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

到了19世纪，法国的翻译进入高潮时期，莎士比亚、弥尔顿（John Milton）、拜伦（George Byron）、歌德、但丁（Dante）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法国，其中仍以莎士比亚为最突出，作品被多次重译。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国际化，科学著作的翻译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德国也是近代欧洲翻译活动的一大中心。歌德、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洪堡（Freiherr Humboldt）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维兰德（Mats Wieland）、席勒、施莱格尔（Wilhelm Schlegel）等文学家、学者和翻译家大量翻译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大陆，法国在政治、文化、科学和艺术领域一直扮演主要角色。在翻译领域，法国的这种优势地位一方面体现在很多德国的翻译都模仿法国的文学模式，另一方面还体现在不少拉丁文、希腊文及其他欧洲语言的德文译本都是从法文转译过来的。在德国翻译家当中，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当属施莱格尔。施莱格尔曾做过大学教授和博物馆馆长，学识渊博，通晓多国语言。他最主要的译作是17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此外，他还翻译了不少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在翻译中，施莱格尔努力做到兼顾原文的形式和内容，既忠实于原著，又能使译文流畅自然以适合阅读者的口味。他的译作是德国文学中的瑰宝。

同法德一样，从17到19世纪，英国翻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时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圣经》钦定本的问世。

1604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在王室宫廷汉普顿宫召集会议，建议重译《圣经》。詹姆斯一世和主教班克罗夫特（Richard Bancroft）亲自设定翻译规则，指派六个小组从事这一工作。这一译本于1611年出版，由于最初詹姆斯一世的支持，故被称作“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虽然事实上，这一译本的出版并没有得到詹姆斯一世的正式批准）。严格说来，



这一译本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对已有译本的修订，但相较此前的英文译本而言，这一译本无论是在内容的精确性还是在语言的文学性方面，都有所超越。钦定本的问世，对英国社会、政治、道德、思想和语言乃至日常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不少基督徒日常读颂的仍然是这本 400 年前的翻译作品。

这一时期，英国译坛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译家，我们在此处只能选取最有代表性的几位略作介绍。首先是 17 世纪的文学巨子德莱顿 (John Dryden)。德莱顿是英国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剧作家和批评家，也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翻译家。德莱顿的译作主要有荷马史诗中的《伊里亚特》、维吉尔 (Virgil) 的《伊尼特》、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贺拉斯的《歌集》、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诗简》等。德莱顿不仅是卓越的翻译家，还提出过不少影响深远的翻译原则和观点，尤其是他提出的翻译三分法，即翻译应分为词译 (metaphrase)、释译 (paraphrase) 和拟译 (imitation)，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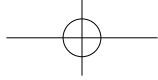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亚历山大·蒲柏 (Alexander Pope) 是 18 世纪英国著名诗人和翻译家。他在其他人的协助下，用英语的双韵史诗体翻译了荷马史诗中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译文典雅隽永，深得读者喜爱。与蒲柏同时代的泰特勒 (Alexander Tytler) 也是英国翻译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泰特勒曾担任爱丁堡大学的历史教授，翻译过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 (Francesco Petrarck) 的作品。泰特勒在翻译实践领域的成就也许不算大，但他的一本《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1) 则是西方乃至世界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阐述翻译原则的作品。

19 世纪，英国的一些大作家如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拜伦、雪莱 (Percy Shelley) 等人都翻译了不少德、法、意等国的文学作品，但这一时期最有名的译著当属菲茨杰拉德 (Edward FitzGerald) 翻译的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Omar Khayyám) 的《鲁拜集》(Rubáiyát)。菲茨杰拉德在翻译时，完全采用意译的方式，将他认为粗俗的部分删除，并加进去一些其他波斯人的作品。这部译作最初出版时读者寥寥，但时隔几十年后，终于获得成功，成为英国文学中的名著，也使欧玛尔·海亚姆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波斯诗人成为西方世界的著名人物。

2.5 现当代翻译

进入 20 世纪以后，西方的翻译活动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翻译活动处于低潮以外，这一时期的翻译在广度和规模方面都远远超出此前的任何时期，而且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首先，同以往翻译活动重点是文学和宗教作品不同，现当代翻译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政治、科技、商业、外交、法律、学术等众多领域，而且这种实



用性的翻译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文学和宗教翻译。如果说此前的翻译主要还是文人雅士从事的工作，那么现代以来，随着各国经济和文化交往的迅猛发展，翻译已经成为大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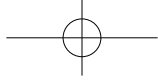
其次，翻译活动呈现出组织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以人文领域为例，欧美出版了大量系列翻译丛书，如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名著丛书》(*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英国企鹅出版集团出版的《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丛书》(*Translation Collection*)等，均系统收录了世界各国的名著英译本。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也以本国文字出版了类似的丛书。此外，二战以后，西方各国创立了大量专门登载译作和交流翻译经验、开展翻译理论研究的杂志，如美国的《美国译协通讯》(*ATA Notes*)、《美国翻译家杂志》(*American Translator*)、《翻译评论》(*Translation Review*)，英国的《翻译与文学》(*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圣经翻译者》(*The Bible Translator*)，法国的《翻译》(*Traduire*)，德国的《外国语言》(*Fremdsprachen*)、《翻译家》(*Der Übersetzer*)，丹麦的《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等。

最后，在翻译方式上，出现了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这一革命性的翻译方式。从1933年苏联的特洛扬斯基(*Peter Smirnov-Troyanskii*)和美籍法国人阿尔楚尼(*Artsrouni*)提出“机器翻译”的主张并获得专利以来，机器翻译经历了高潮与低谷期。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机器翻译，特别是计算机辅助翻译(*CAT*)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在商务和技术领域，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应用。

二、名家见解

谭载喜(1953-)先生现为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学者、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和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译作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其著作《翻译学》、《西方翻译简史》、《新编奈达论翻译》等在国内翻译理论界有很大影响。

自古至今，西方的文明史与翻译事业的发展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翻译在促进民族文化的诞生和发展、促使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转化的过程中，起了两个主要作用：一是促进文化交流，二是传播思想观点。任何一类作品的翻译，不论是科学作品，艺术作品，还是宗教作品，都兼有



翻译通论

1

这两个功能，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民族科技书籍的互译，主要在于交流或交换科学成果，但其中也就包含着灌输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因此它有向异国文化传播思想观点的一面。例如，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等等，在翻译中都具有上述双重功能。《圣经》之类的宗教译作主要在于传播教义，使人们受到影响，接受其中的观点。至于哲学、文艺等方面的译著，更是体现了翻译工作的双重功能。这是显而易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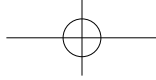
迄今为止的西方翻译史，就是西方各民族文化的内部交流与外部交流，并在交流中相互融合、不断发展的历史。没有翻译和借鉴，民族文化就只能在狭窄的小路上爬行，整个人类的文化也会因缺乏横向联系而徘徊不前。相反，正是通过大规模的翻译和借鉴，各民族才有机会使自己扩大精神视野、丰富知识宝库、更新价值观念、增强创造激情、提高文化水平，从而把西方文化铸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实体。美国诗人艾略特曾经说过：“欧洲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文学能独立于其他的文学而存在……”¹德国文学巨匠歌德从不同的角度也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德国文学大部分就是从英国文学来的！我们从哪里得到了我们的小说和悲剧，还不是从哥尔斯密、菲尔丁和莎士比亚那些英国作家得来的？”²至于各国的文学家本人，从英国的莎士比亚，到德国的歌德、法国的巴尔扎克和俄国的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也无不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益于翻译文学。我们指出这一点，无非是要强调这么一个事实：在西方的历史长河中，翻译起了超出人们一般想象的巨大作用。（谭载喜 1991：10-11）

孔慧怡 (Eva Hung)，香港大学一级荣誉文学士、伦敦大学哲学博士。1987年1月起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译丛》主编。1997年5月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发表学术论著及中国文学英译独立成书者十余种，学术论文数十篇。

卜立德 (David E. Pollard) (1937-)，著名的汉语文学翻译家，1970年从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院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获得哲学博士，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教授。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高级研究员。

A vast country with scores of regional languages, China has probably witnessed

- 1 艾略特：《诗歌的社会功能》，见《美国作家论文学》第197页。（刘保瑞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
- 2 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48页。（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第1单元 翻译的历史

1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ctivities since the first tribal battle or produce-exchange. Early historical works such as the first century B.C.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contain many references to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plomacy and commerce. As early as the Zhou Dynasty, in the ninth century B.C., there were special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charge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work; their titles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group of languages they covered. An integral part of protocol, they were always present at meeting with foreign emissaries. The term for a government interpreter of this period was *sheren*¹, literally ‘tonguesman’. The current Chinese word for ‘translation’, *yi*, forms the basis for the official title adopted since the Han Dynasty (195 B.C.-A.D. 7): *yiguan*² or *yishi*³, literally ‘translation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also show tha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yizhang*⁴) were routinely employed by merchants on their long trips to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they were also present in the merchant caravans bound for states such as Bactria⁵ to the north-west of Chin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618-906), a period in which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her neighbouring states reached new height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foreigners who lived in China were employed as government interpreters and were allowed to accompany Chinese officials on diplomatic missions.

In the 3,000 years from the Zhou Dynasty to the present, the bread-and-butter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work has always been in government and commerce. There are extant poetry translations dating back to at least the fourth century B.C., but these early literary translations were mostly recorded as part of the experience of various diplomatic missions. There have been periods, however, when translation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China’s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going far beyond the confines of government and commerce. The most significant of these periods relate to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work of Christian missionaries,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vents leading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subsequent contact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But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have also had a role to play in China outside of such peak periods and, apart from the major languages involved in those periods,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inese books have been translated from

-
- 1 舌人。——编者注
 - 2 译官。——编者注
 - 3 译使。——编者注
 - 4 译长。——编者注
 - 5 指中亚古国大夏。——编者注

the eleventh century onwards into such languages as Mongolian, Western Xia, Manchurian and Japanese. (Hung and Pollard 1998: 365-366)

三、个案研究

1

清末著名翻译家严复曾翻译过大量的西方书籍，在当时引发巨大反响。下面是他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斯（Edward Jenks）所著《社会通论》（*A Short History of Politics*）一书中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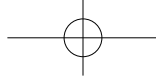
原文

But it is convenient to reserve the term politics for matters concerning one particular and very important class of societies, those communities namely, which are not formed for any special or limited objects, but which have grown up, almost spontaneously, as part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mankind, and which are concerned with its general interests. Men as a rule, live in these communities, not because they choose to do so, but because they are born into them; and, until quite recently,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change them at their pleasure. In their most advanced forms, we call these communities States.

译文

然吾党必区治制之名，以专属国家者，以其义便，而国家为最大最尊之社会，关于民生者最重最深故也。夫国家之为社会也，常成于天演，实导师于人为，一也；民之入之，非其所自择，不能以意为去留，其得自择自留，特至近世而后尔耳，然而非常道，二也；为人道所不可离，必各有所专属，三也；其关于吾生最切，养生送死之宁顺，身心品地之高卑，皆从其物而影响，四也；为今古人类群力群策所扶持，莫不力求其强立而美善，五也。此五者，皆他社会之所无，而国家之所独具者。是故，国者，最完成尊大之社会也。

在仔细阅读原文和译文后，请你找出译文与原文不相对应之处，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析严复这样做的原因。



第 1 单元 翻译的历史

思考与讨论

1. 请简要列出中国翻译史和西方翻译史的异同，并给以解释。
2. 请结合中西翻译史谈谈你对翻译活动未来趋势的看法。

延伸阅读

1. 马祖毅.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2.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2005.
3.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 Hung, Eva & David Pollard. “Chinese Tradition”. Mona Baker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1